

學術對談

「學術出版與傳播研究」圓桌會議討論

對談人：李少南、邵培仁、胡智鋒、郝曉鳴、陳炳宏、
陳韜文、馮建三、趙晶晶

主持：葉月瑜

統稿：蘇鑰機

其他發言者：邱林川、姜飛、洪貞玲、韋路



《傳播與社會學刊》五周年國際學術會議主題一：
「學術出版與傳播研究」圓桌會議留影

李少南,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主編; 邵培仁, 《中國傳媒報告》主編; 胡智鋒, 《現代傳播》主編; 郝曉鳴, 《亞洲傳播學報》(*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主編; 陳炳宏, 《中華傳播學刊》主編; 陳韜文, 《傳播與社會學刊》主編; 馮建三, 《新聞學研究》主編; 趙晶晶, *China Media Research* 主編; 葉月瑜,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 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姜飛,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教授; 洪貞玲,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 韋路,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3期(2013)

「看看大家對過去五年中華傳播學的研究情況有何評價。其他問題涉及個別期刊的定位、目標讀者、提交論文政策、編輯顧問委員會的角色等。我們又想了解兩岸三地及海外的期刊發表論文中，有沒有一些趨勢，及期刊面臨甚麼問題。究竟中華傳播學研究整體發展方向應如何走，及主編們關心的其他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Dialogue

“Academic 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ound Table Discussion

Discussants: Paul S. N. LEE, Peiren SHAO, Zhifeng HU, Xiaoming HAO,
Ping-hung CHEN, Joseph M. CHAN, Chien-san FENG,
Jingjing Z. EDMONDSON

Chairperson: Emilie Y. Y. YEH

Editor: Clement Y. K. SO

Other participants: Jack L. C. QIU, Fei JIANG, Chen-Ling HUNG, Lu WEI

Abstract

Participants of this round table discussion on “academic 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cluded eight journal editor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at the conference. The journal editors focused on three research articles o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issues in 11 related journals and had knowledge of

Paul S. N. LEE (Editor),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Peiren SHAO** (Editor), *China Media Report*; **Zhifeng HU** (Editor), *Modern Communication*; **Xiaoming HAO** (Editor),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Ping-hung CHEN** (Editor),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seph M. CHAN** (Editor), *Communication & Society*; **Chien-san FENG** (Edit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ingjing Z. EDMONDSON** (Editor), *China Media Research*; **Emilie Y. Y. YEH**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lement Y. K. SO**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ack L. C. QI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ei J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Chen-Ling 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u WEI** (Professor),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 (2013)

major issues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editors were asked to comment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al statu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field, as well as other topics of interest to them. Some other scholars also provided their views in the special theme sess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So, C. Y. K. (2013). “Academic 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ound table discuss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 7–30.

引言

葉月瑜：我們進行的是一場頗特別的圓桌會議討論，題目是關於學術出版和傳播研究。在座的參加者包括中華傳播學界有「CI光環」(即引文目錄Citation Index的榮譽)的學刊主編們，計有《新聞學研究》的主編馮建三，《亞洲傳播學報》(*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主編郝曉鳴，《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主編李少南，《中國傳媒報告》的主編邵培仁，《China Media Research》的主編趙晶晶，《中華傳播學刊》的主編陳炳宏，及《傳播與社會學刊》的主編陳韜文。我們先請蘇鑰機做一個簡單的引言，然後請每一位圓桌評論員作簡單討論，之後開放給在場所有的老師和同學提問及發表意見。

蘇鑰機：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共同舉辦這個會議，其中一個主題是「學術出版與傳播研究」，以慶祝《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五周年。我負責這個主題，邀請了一些專家來寫論文，並趁此機會收集資料，看看我們華人學術學刊現在的情況怎樣，在過去五年做了甚麼。我們希望透過比較的角度，看看不同地區、不同期刊、不同年份的情況如何。我們開了一個名為「內容與引文分析」的新科目，希望用具體的研究來帶動課程，和學生一起做研究，將結果和大家分享。同時我們希望通過資料的收集，請期刊主編來講講他們的意見，並談談他們期刊的情況。

我們事先把內容及引文分析的論文(及其餘兩篇論文)送交各位主編，也準備了10條問題，希望可以作為討論的參考框架。這10條問題中，有些關於我們所做的調查結果，看看大家對過去五年中華傳播學的研究情況有何評價。其他問題涉及個別期刊的定位、目標讀者、提交論文政策、編輯顧問委員會的角色等。我們又想了解兩岸三地及海外的期刊發表論文中，有沒有一些趨勢，以及期刊面臨甚麼問題。究竟中華傳播學研究整體發展方向應如何走，主編們關心的其他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編按：《現代傳播》主編胡智鋒

因事未能出席，後來他提交了書面意見，一併放在下文相關位置。)

期刊的定位

陳韜文：《傳播與社會學刊》是一個為華人社區服務的平台，這個平台首先是用來發表優秀而且希望是有創見的論文。第二是我們想鼓吹跨學科，所以叫《傳播與社會學刊》，刊名中這個「社會」是廣義的社會，包括文化在內。我們也希望放眼國際，立足本土。這個是口號也是實質的，我們一直按照這個方向走。因為國內有些學者想到海外，就想到量化研究、問卷調查等，我想強調《傳播與社會學刊》是沒有任何方法上的偏向，對量化和質化的研究我們都持開放態度，理論方面也是很多元性的，允許理論多元主義和方法多元主義。但是文章一定要符合邏輯、有創見，這個是我們要求的，不管你用甚麼研究方法。

李少南：儘管我們叫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但是我們的願景不光是研究中國社會的傳播問題。最初的定位是希望加強我們和西方對話，用另一個更強的說法是要把話語權奪回來。因為我們有些同事在過去二、三十年都有這種經驗，偶然有一些西方刊物的學者，他不是批評你的論文寫得不好，而是問你為甚麼做台灣或香港的研究。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們最初的定位是希望加強跟西方的對話，現時基本上是集中研究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傳播現象。我們下一步希望變成不只是看中國社會的傳播研究，而是擴展到看全世界的研究，接受研究中國社會以外的稿件。

邵培仁：《中國傳媒報告》定位在國際性、創新性、交叉性和前沿性。它是中國大陸第一份面向全球出版發行的傳播學刊物，鼓勵以人文、文化、思辨的學術精神和多元、立體、獨特的理論視野，進行傳播研究。我們希望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兼顧，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並舉，立足中國傳播與媒介定位，面向

海內外傳播理論界與實踐界，反映海內外傳播學界的最新成果，鼓勵傳播學界與其他學科的對話與交流，開拓面向世界和未來的學術視野。

趙晶晶：*China Media Research* 希望把國外先進的傳媒思想和研究方法借鑒到中國來，同時也把中國好的傳播想法和研究方法介紹到國際去，這是我們創刊的初衷。我們稿件是很多的，錄用的稿件大概佔20%，有些稿件的水平和研究方法和國外差距比較大，未能被接受。還有英文的問題，很多大陸學者的英文較差，他們雖然有很好的傳播想法，還是不能介紹到國外去。我很希望開拓我們刊物的視野，如最近邀請了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的主席，還有美國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的主席，到浙江大學與我們交流。為了開拓跨學科之間的交流，我也和國際哲學家協會的主席，還有管理協會的主席等進行訪談，問他們有關今後世界上的發展趨勢，因為傳媒與這些有密切的結合。

郝曉鳴：我們這個刊物和其他的不一樣，面對的範圍更廣，有關中華傳播的研究只佔我們稿件的大概30%。最多的稿件來自韓國，倒不是因為韓國的傳播研究做得更好或更重要，而是他們有很多人在做研究，而這些人都是受過西方訓練，比較符合我們的論文規範，所以韓國來的文章最多。*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並沒有把中國作為一個重點研究對象，我們希望是看整個亞洲，擔心的問題是亞洲其他地區的研究數量不足，因而稿量不夠。

胡智鋒：我們《現代傳播》是教育部主管、中國傳媒大學主辦的以廣播電視及新媒體等為主要研究領域的傳媒學術期刊。這是中國大陸相當典型的體制內期刊。我們刊物創辦於1979年，33年來有過幾次較大的定位調整，從1998年以來定位基本穩定。我們有兩個重要參照系統：普通人文社科學報和傳媒業界創辦的期刊。在中國大學1,400多種人文社科學報中，我刊以研究新聞傳播彰顯特色；在上百種新聞傳媒業界創辦的期刊中，我刊因其較強的學理性彰顯「學院派」特色。

編輯權力及優先考慮

邵培仁：《中國傳媒報告》針對主辦單位和編委會成員制定了專門的論文提交政策，嚴格控制主辦單位發表論文的質量和數量。在質量相同的情況下，主辦單位和編委會成員單位的論文確實在選用方面有所加權，但是院內發文的數量一直嚴格控制，一般不超過25%。

郝曉鳴：作為主編沒有甚麼特權。文章想通過我來發表是沒有用的，因為所有的文章都是由副主編來組織審閱工作。我唯一的權力是，我們最近新開一個欄目叫 *Critical Review*，請一些學者來研究和分析整個傳播學的走向。這類文章我們不須要通過匿名評審，可以通過編委進行討論來決定是否接收。一篇很好的文獻回顧文章可以有很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它有批判的性質。曾經有一本雜誌的影響因子 (impact factor) 一年間從零點多漲到二點多，就是因為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文章，然後有主編強調大家要多引用，結果該雜誌的整個影響因子就高了起來。當然我不是單單為了加強影響因子的表現，而是希望有一些綜述性、有見解的文章可以登在雜誌上，會被更多人看到。

李少南：坦白地說，編輯委員沒有優先，只有優後。優後的意思是，我們基本上不鼓勵自己的委員投稿在自己的刊物上，包括學生和老師。蘇鑰機的研究發現，我們很多中文大學老師的文章出現在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你就看見端倪了。原因是我們希望同事向外面投稿，而不是在自己的刊物發表。

陳炳宏：擔任期刊主編，我對主編的權限常有些困惑，例如主編有直接退稿或決定重審的權力嗎？舉一次我個人投稿的經驗來說，投出沒多久就收到主編回信說，他們的讀者對我的題目沒有興趣，就直接被退稿了，所以感覺國外的主編有很大的權力。作為主編，我還碰到一個狀況，兩個審查意見中，一個評審跟我說可以接受，另一個說要退稿，那表示兩位都覺得不用再審了，那我該怎麼辦？我送第三者，那麼第三者就

變成這篇論文的決定者，這就是另一個主編權限的問題。另外我偶爾會接到一些抗議信，甚至有些投稿者不服氣評審的意見，要求重審。因此我常常在問自己，作為主編到底有多大權力，常有困惑，但也還沒有答案。

胡智鋒：我們刊物實行三審制，即責任編輯進行初審，編輯部主任和相關專家進行複審，編前會主編和編輯部主任及所有責任編輯一起討論，此為第三審。應當說每一審都有一定權力，責任編輯從大量稿件中按照刊物定位要求進行選擇，編輯部主任和相關專家可以與每位責任編輯協調，編前會上大家可以各抒己見，當然最後做決定的還是主編。我們要求本校作者稿件平均不能超過40%，而本刊編輯包括主編每年最多只能發一兩篇。訪談對話類稿件除外。

選稿原則

郝曉鳴：投稿的立意要比較新穎，要有一些新的想法，又能提出一些新的理論，這無論是在原有的理論上進行發展，還是提出新的觀點。還要有比較規範性的學術文獻回顧，運用正確的方法進行分析。最後的決定是要看匿名評審結果，這種做法比較專業。

李少南：我們採納稿件最重要的一個標準是，這個文章是否讓我們對某個傳播或社會現象增加了認識，是否有新的東西。如果只是重複一個西方理論，我們的興趣不大。假如你對課題提出新看法，或是有新發現，這是重要的，畢竟我們是生產知識的行業。為甚麼要有新知識？因為它第一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第二是提高生產效率，令社會進步。第三是尋求有趣的答案，反正我不管有甚麼重要意義，感興趣的話就去尋求答案。

我把scholarship翻譯為「學養」，是學術素養而不只是學術。學術素養有四個方面，第一是發現，第二是整合，第三是教學，第四是創作。但是現在我們只是偏重發現，所以在評價一本新書時，如果是教科書就說不行。我們評同事升等

也一樣，所以現在沒有同事願意寫教科書了。但是我們應該看這教科書是否很多人都在用，它能否促進知識的散播。有關整合方面，Joseph Klapper曾經寫過一本名為*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的書，他把前人做的研究歸納起來，並提出自己的看法，究竟傳媒是有效果還是沒有，他就釐清了一個時代的問題。但現在我們沒人願意做這種整合的事情，因為拿來評等時會被指不是新的東西，覺得意義不大。Wilbur Schramm編的*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書也是開創性的，他的角色是編輯，但其重要性絕不比現在的期刊文章作者為低。

陳韜文：論文的社會相關性和理論性是重要的。作為華人，我們自然對台灣、大陸或香港的事情感興趣，例如最近在大陸發生的烏坎抗爭事件，我們自然就對它有興趣，尤其是當事件本身具有重要性。但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就不會有這種感覺，他可能覺得阿拉伯之春更重要。這也沒有對錯之分。那麼怎樣才算是重要的東西呢？除了文化偏好以外，就是看你的研究有沒有足夠的理論性，對世界學術界有沒有參考的價值。這牽涉到比較角度及研究。如果你將中國和別的地方進行比較，無論是真實的比較或是潛在的比較，別人應會更重視你的文章。

胡智鋒：我們刊物的選稿原則是稿件應體現學術性、思想性、前沿性、現實性。所謂學術性自然應當在所研究領域有新觀點、新方法、新文獻、新發現等；思想性指的是對傳媒整體發展有批判、有反思、有質疑並言之有理；前沿性指的是研究領域或方法的新探索、新開拓等；現實性指的是對當下傳媒事業或教育研究中的問題經驗進行總結梳理，有現實針對性，有問題意識。

專題安排

群認為當下我們最須要關心的議題。我認為這是很好的做法，可是它會面臨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或是說期刊主編個人的意志和興趣取向的問題。

郝曉鳴：我們做學術論文專輯時，也採取公開的方式，任何人提的專題要經過編委會的評審，而且所有收集的論文都要通過匿名評審。評審的第一個階段是由編委會組織，不是由專輯的主編請人評論，以保持公正。專輯原來建議有六篇論文，最後實際發表可能只有三到四篇，因為有些最後還是被匿名評審審掉了。

陳韜文：我感覺專題的做法非常好，因為它比較集中一個題目作深入探討，其影響是比較大的。我們現在一年有四期，其中兩期是專輯。專輯如果還有篇幅空間的話，可以同時刊登獨立的論文。現時專輯的比例可能稍多了些，但對一個初創的期刊是有好處的。專輯也是要審稿的，這是基本要求。從規劃的角度看，如果編輯對研究情況有想法，就可以推動一下，就某個主題組織專刊。當然，動力可以源自編輯外部，學刊應該開放讓其他學者參與專輯的策劃。我們學院剛在舉辦主題研究工作坊，它的部分成果可以變成專輯，是與學刊的有規劃配合。

邵培仁：我在編輯過程當中發現，約稿得來稿件的質量，平均來說要比投來的稿件好。譬如我約在座的學者寫一篇文章，就是你自己認為寫得不算很理想，往往也比投來的稿件質量要好得多。因為你會很在乎自己的學術名聲，不會把太差的文章送出來。

馮建三：製作專題是比較理想的，對於期刊來說，只要人力及時間足夠，維持部分企劃，部分開放，是不錯的選擇。企劃代表期刊編委會的主動發掘與導引。比如，我在拜讀蘇鑰機等人的分析時，發現有些文章歸類在「國際傳播」，這恰好是我自己近年甚感興趣的部分，也很重要。那麼，有沒有可能就此發揮？我是說，1970、80年代的「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似乎早就消失，

不再是學術話題。然而,從另一些層面看,並非如此,我是指本世紀初有關「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及踵繼其後,2006年開始的「互聯網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以及2007年開始執行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就我觸及的文獻,這些活動或公約,明顯有其內在聯繫,但華人對此好像注意較少。那麼作為刊物編輯人,我們有沒有責任就此製作專題,讓大家注意這個重要的議題?

另外,公共傳媒特別是公共服務廣電制度,在華人社會還不熟悉或實踐相當有限,例如曾蔭權在2006年想處理香港電台的改制問題,要將它公營化,現在它又做回政府的一個部門。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其實是台灣最大的媒體集團,可是客觀上它沒有甚麼效果。近年中國大陸內部談論公共電視和公共媒體的人也在增加,雖然實際人數仍不多。不過中國大陸未來還是會有改變的,應有一個比較規範性的想法,來整合地考慮這個問題。在主編考慮企劃時,對這些重要的議題,我們有沒有可能獨自或跨學校合作進行?

胡智鋒:我們刊物設置專題的情況有幾種:一是重大傳媒事件,如汶川大地震的新聞報道、奧運報道等,我們會採取組織專家稿件與選取優秀來稿相結合的方式組織專題;二是重要研究課題系列成果,如關於廣播電視公共服務、中國影視文化建設等,圍繞主題,多位學者從不同視角展開闡釋;三是責任編輯從大量來稿中發現共同或接近的研究話題,整合成一個專題。當然這裏也會有責任編輯個人的偏好起作用,如關於微博傳播、公共外交與大眾傳播等。

SSCI帶來的問題

郝曉鳴: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在進入了SSCI之後,得到的第一個影響因子數值是0.42,也就是說我們文章中大概有

42%的文章被引用過一次。在整個SSCI的57本傳播學類雜誌當中，我們大概排在40多位，應該說不是太差。我擔心的是下一個因子數值是降還是升，因為國外非常強調影響因子的分量。很可惜我們這個雜誌還沒有被我們學校列為第一流的雜誌之內，因為它完全是按照影響因子來排列的。大家不管影響因子也不行，因為它確實影響到投稿人的意願，因為投稿人會問這個雜誌的影響因子是多少。如果影響因子很高，他就會把很好的稿件送給你。當然這實際上是個遊戲，如果我們局限於中華傳播或亞洲傳播，你的影響因子永遠不會太高。要想高的話，你私下搞一些交易，譬如我和《中華傳播學刊》兩家合作，你規定你的文章要經常引用我們，我們也經常引用你的，我們的影響因子馬上就高一點了。我們當然不會搞這種歪門邪道的東西，但是這個事情對我們有是頗大的壓力。

李少南：不管是西方、亞洲還是中國，都慢慢讓SSCI變成一個着迷的魔咒了。我覺得這有問題。我們發表論文是因為要尋求一些新的知識。問題是我們怎樣判斷文章同時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呢？我們一般說這個論文被引用得多，就有這個水平了。我承認很多時候是這樣，引用多就是重要性高。但我想強調這只是其中一個標準，更不是唯一的標準，也不是最重要的標準。我在評審其他同事升等的時候，也是看SSCI，看影響因子，這對行政人員來說最方便，但這不是最理想的做法。是否引文很多的文章就可以幫助我們改善人的生活？是否就可以提高生產效率或令社會進步？或是真的讓我們尋找到有趣的答案呢？

我現在就擔心越來越走向SSCI、TSSCI、CSSCI，說不定將來中文大學(CU)也要弄一個CUCI！大家想像一下最後會變成甚麼情況。假如我們把它變成唯一的標準，將來我們一幫人聚在一起，就像理工科系一樣，現在傳播學中兩個作者的文章最多，以後可能是20個作者，然後大家你引用我，我引用你，引文的數值就比醫科的還要高。大家玩這個遊戲的話，造成的問題是，比較重要、需要長時間撰寫的論文及

著作不能出現。現在沒有人願意做長期的研究,最好一年能發表三、四篇論文。你如果三年才發一篇的話,根本不能升等,很難在學術界生存。

儘管現在SSCI對中國大陸來說有一些進步的意義,但長遠來說,我覺得我們只是看SSCI的話,會出現學術依賴情況。我覺得中國大陸發展CSSCI是對的,但現在CSSCI的信譽未夠。你在鼓勵重視SSCI的同時,應該更好發展CSSCI。相對來說,台灣的TSSCI發展得比較好。最好就是三個地方都有一個資料庫,並且一起來做,標準可能更完善,大家互相有正面的影響。

章 路: 這個SSCI魔咒已戴在香港學者的頭上,並慢慢延伸到中國大陸。譬如「九八五」的學校有相關規定,要申請升等教授的話,如果沒有SSCI的文章,基本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這些學校都在搞國際化的進程,比方說浙江大學明確提出要在2017年左右建成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一個重要標準就是SSCI論文的數量。所以導致我們老師要拼命地要去投稿,而且實際效果非常好,2010年浙大發表了數十篇SSCI的文章,到了2011年一下子漲到200多篇。所以我們預測,可能未來這一趨勢會更明顯。因為校方認為,老師們還是有相當多潛力可以挖掘的,說不定繼續挖的話,可能漲到400至600篇。

這樣的一個SSCI政策導向,對於中國大陸學者來說,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一方面,我們的確感受到,目前中國大陸的學術刊物存在很多問題,如沒有嚴格的匿名審稿和主要發自己單位的文章等。所以要求大家去發表SSCI的文章,至少在品質上可能比國內刊登的文章要好。但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只發SSCI的文章,我們國內刊物的品質會越來越差,本土的研究自主性會越來越弱。這樣可能是個悖論,使我們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我認為在當前的大陸現狀之下,走SSCI導向可能還是利大於弊,至少可以逼着大家往更高的標準去走。但是經過這個階段之後,當大家的研究做得越來越規範,我們就可以放鬆一下這個要求,轉為推廣一個更多元化

的學術平台體系。

胡智鋒：SCI或SSCI的確已成為目前學術評價繞不開的一個話題。儘管影響因子、轉引率之類並不能完全說明學術水平，但為甚麼大家依然熱衷於這個評價方式呢？我認為一是受到理工科評價方式的嚴重影響，似乎只有這樣量化的數據指標才夠科學，而口碑等主觀評價就不夠科學；二是與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利益息息相關，尤其在大陸，這樣的數據指標影響着院校排名；三是與作者自身的利益息息相關，沒有這些數據指標，就很難給出升級的理由。在目前的學術氛圍中，這是無奈的選擇。

不同地域學者的情況

郝曉鳴：根據我們收到大陸學者的文章和參加會議的經驗，我覺得大陸有頗大進步。但是從學術規範來說，差距還是很大。在收到國內的稿件當中，我們基本知道有一小部分學者能夠寫出適合我們刊物的論文，但是絕大部分老師的論文都不適合。有些老師認為是語文的問題，因為我們是英文刊物，但是否完全是語文因素？我覺得學術研究要考慮的是應該怎樣立題，怎樣設計研究方法，明確你想達到的研究目的，及如何去分析資料，在這些方面國內外之間仍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國內老師論文的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真正在落實時，他們的思想未能應用到客觀研究，或是通過他們的研究來證實一些理論，這是很可惜的事。這些老師在學術規範上很難達到我們國際刊物的標準，所以他們的想法未能在外間傳播。這個差距也不是不可以彌補，事實上我覺得正在不斷縮窄。特別是國內有很多學者在國外接受了基本訓練，或者到國外進行短期訪問，回國之後應該把學到的東西應用在他們的研究中，令我們的學科更規範化。

趙晶晶：香港和台灣要與國際接軌，具有地理和語言等優勢，它們有很多教授在海外拿到博士學位回來，研究方法自然更見成

熟。大陸學者也可能有其優勢，雖然說大陸的傳播研究還是建基於西方傳播研究體系，但由於大陸與國際的傳播研究相對隔絕，這反而使大陸學者有時能提出一些獨特的看法，而不是完全受西方影響。很多大陸學者的人文根柢比較好，我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大陸的學者會有後發的優勢。

大陸很多與西方接觸比較少的學者，一般都比較喜歡採用質化的研究方法，討論比較宏觀的問題。大陸近年與國際接觸較多，很多學生到國外受教育，隨着年輕一代的成長，大陸在研究方法方面更容易與國際接軌。

西方的研究方法是否最好？以前歐美的研究方式絕對是第一流的，其他人都是跟着歐美在走。今後中國在研究方法和學術規範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發言權？中國會否有自己的影響力？中國的經濟強大起來，就會有一些影響力。隨着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提高，中國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規範有可能逐漸上升。我們 *China Media Research* 如果發現大陸學者中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都給他們開綠燈，大力扶持大陸本土的東西。

邵培仁：中華傳播學研究整體發展趨向大融合，互動越加頻繁，合作已蔚然成風。希望將來在兩個方面着力，一是共同找尋中心理論。來自不同地域的中國人拋去意識形態與地區利益的隔閡，共同以中華傳播學研究為中心，形成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本土傳播理論和傳播實踐。其次是共同研究內核創新，通過對中華傳播學中心理論的找尋，逐漸提煉出中華傳播學研究的內核與基因，彰顯中華文明的特色，顯示與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東方傳播學術。

華人學刊面對的問題

郝曉鳴：海外學者的文章大多數在建樹性上還是很差。90%的文章基本是在應用西方的理論，重複檢驗國內的問題，這樣對學術發展其實沒有太大意義。檢驗西方理論的研究在開始階段是

有一定意義的，但是過了20年後我們繼續再做這樣的題目，其實沒有意義。很多韓國文章都是同樣的情況，framing 或者 agenda setting 的研究做了幾十年，其實大家對道理都懂了，但還是重複地做。從學術規範上，他們做得很符合要求，但實際上沒有創見。我們希望發表一些有意思的文章。舉例說，有位印度學者研究的是從印度早年移民到美國去的人，他們在印度時沒有甚麼電視文化經驗，後來去到美國接受當地電視文化洗禮。隨着網絡的發展，有很多印度電視節目進入美國，這位學者用研究這些早期印度移民如何用美國看電視的經驗來看印度的電視節目，這個研究就頗有意義，角度是新穎的。我希望有更多這種有創見的文章，它們那怕在學術規範上差一點，但我們覺得有新意的話還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希望中國學者所作的課題研究可以在國際上發表，來擴大我們整個中國傳播學界在國際上的影響。光靠我們國內及《亞洲傳播學報》等刊物還不夠。坦白說，無論是中華地區的傳播刊物，還是《亞洲傳播學報》，登的基本上都不是我們中國學者發表的第一流文章，他們的最佳文章一定送到國際更知名的刊物上。刊物是否知名，就是你的讀者群夠不夠大，你的引文用得不多。

邵培仁：中國大陸學術期刊的主要問題，包括以版面費的形式拿刊物做交易，及一般只發短稿件以增加發文量。這兩點直接影響了發表論文的整體質量，污染了學術風氣。同時，大陸期刊的體制內性質，決定了其研究內容與方向，限制了專業學術期刊的自由探索，不利於傳播學研究的深化和突破。解決之道在於通過行業規範或立法形式，明令禁止有償發稿，同時改變科研院所的評價體系標準，不宜規定死板的發文任務。通過與港澳台及新加坡等華人傳播學期刊的互動合作，擴大大陸期刊的視野，以「進軍世界傳播學主流研究」為旗幟，尋求體制內的突破。

大陸很多新聞與傳播學刊並不是掌握在大學手裏，而是由媒體控制，例如報業集團和廣播電視集團，而這些刊物的

編輯都是快要退休的記者編輯，他們在第一線採訪新聞跑不動了，於是去編刊物。另外，在媒體工作的人也要評職稱，他們也要發表論文，而且現在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一方面他們要有新聞作品獲獎，另一方面也要有論文，實際上他們就和大學在爭奪資源。所以為甚麼有學者說審稿人的品質和作者的品質不高，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刊物的稿件要求質量比較低，於是許多大學就寫這樣的稿件給你，也容易通過。

馮建三：《新聞學研究》大多數時候像是守株待兔，一方面因任期短，要規劃方向就有困難。另一方面，進稿量大，最近幾年是一年平均在80到100篇。處理現有的投稿花的時間挺多，若要另作推動，主動企劃特定主題，不免對編委會造成更大壓力，因此就經常卻步了。當然，我們並不是所有稿件都送外審，部分文稿在編委會內審階段，就有共識，有時因為主題或是品質的考慮，我們會逕自說明後退稿，一般來說這樣的稿件約佔進稿量一成多。

雖說如此，編委會為了避免作者太過「勤勞」，也為了免除編委會內審耗用過量的工夫，近日因應一些情況，要求每位作者一年最多只能投稿兩篇，半年不能超過一篇。畢竟，一年能寫作兩篇自己認為值得發表的論文，成績已屬不錯，在平均以上，兩篇稿件都投遞給同一刊物，似乎太偏愛該刊物，也對其他刊物的稿源有不好的影響。在發行方面，我們越來越重視互聯網，為此我們也減少印刷數量，從2007年1月起網路本與紙本就開始同步發行，當期全文也隨即可以自由下載，我們也主動蒐集華人傳播社群的資料，儘量主動按季寄出刊物已經出版及其電子連結的通知。

李少南：我們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進入 SSCI 之後，稿件突然間多了很多，這個情況無可避免。我們的審稿人手不夠，有時候要依靠比較年輕的學者，比較資深的太忙，不願去做。但是我們又不願意找太多剛畢業一、兩年的學者去做評審。大家知道傳播的領域很多，有人際傳播、大眾傳播、

國際傳播、網絡傳播、健康傳播等，但是每一個範疇可找到的專家不多，所以我呼籲假如我們邀請你來評審的話，請盡量幫忙，因為大家的幫忙可確保刊出文章的素質。

陳炳宏：《中華傳播學刊》在這六年來，平均每年投稿有68篇，大概每三個星期就要處理四篇進稿，到2010年底《中華傳播學刊》的接受率大約是13%。兩本TSSCI期刊每年共六期，《新聞學研究》有四期，《中華傳播學刊》有兩期，可以發表約24篇論文。雖然台灣的學術社群比較小，但還是很難滿足300位以上傳播學界老師的需求。有人曾提議，可否呼籲所有的資深教授暫時不再投這兩本TSSCI期刊？我想強調的是，在TSSCI的框架下，有些期刊可能永遠處於撐的狀態，但有些則處於飢餓狀態。我每天都要花一、兩個小時在處理期刊相關電郵，甚至執行編輯做任何更動我都要重新看過，還有收到投稿、格式修正、選擇評審、審稿意見等等來來回回的所有信件，執行編輯都需要我重新看過才寄出，因此《中華傳播學刊》主編與執編的工作量都相當大。

如前所述，除了兩本TSSCI期刊外，感覺其他的台灣新聞傳播學刊永遠沒有足夠的投稿者，所以有些主編就必須到每一個研討會上去求好的稿子。這種求好稿的行動有時還會讓作者感到困擾，因為他們還是想投給兩個TSSCI的期刊，導致期刊不是會撐死，就是怕餓死，這是目前台灣傳播學術社群期刊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吧。

陳韜文：在《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時，我們學院同時考慮要創辦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為甚麼要有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期刊呢？這對我們是個考驗。在香港，英語是重要的語言，殖民地歷史原因令很多人使用英語，所以大家都習慣在英文刊物發表文章。那為甚麼又要出版一本中文的刊物呢？當時我們認為，從長遠來看，無論是香港、中國大陸或台灣，都有主體性的考慮。中文書寫是基本的，儘管將來中國可能越來越多的人用英文寫作，但那仍是少數，不會取代中文書寫的主體性。我們覺得要加速中文學術的發展，所以

就創辦這本以中文為書寫語言的學刊。

在辦這本刊物時，語言的選擇反映了一個重要的議題：立足本土如何同時放眼世界？怎樣跟國際學術界有對話？現在中國的事物較受關注，因為中國強大，你不能忽略她它，從學刊出版到新聞諸方面都看到這種情況。從語言和地域看，美國人首先對美國本土的東西最有興趣，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主要以本國的事物作為研究對象。那麼大家怎樣交流對話呢？從學刊的作用來說，我們想到的是應該如何把外間的東西引進來，所以我們的期刊有個「學術對談」欄目，每期都請一位知名的大師來講他的研究經驗。另外，在我們刊登的論文中，中英文的引文都有，比例也差不多，這也是一種對話。

但是我們的刊物是中文的，外國人怎樣來閱讀你的文章？所以長遠來說，希望有個華文的平台，假如裏面的論文真的有創造性，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外國人想不看也不行。他們可能要通過翻譯來看中文刊物的論文，因為知道裏面有好東西，所以願意這樣做。如果真的言之有物，就不用害怕別人不看重你，當然這需要長期的努力奮鬥。

馮建三：我想轉述2004年台灣學界舉辦的「高教評鑑研討會」的10點共識，這裏先得說明，我自己也是參與主辦的成員之一，但這些結論是共同討論所提出，不是我個人之見。其中，關於論文發表與期刊的部分，我們的主張是「語言平等，華語優先」，我們並且認為華語也是國際語言。無庸贅言的是，我們並沒有排除使用英文，只是強調語言平等。退一步言，沒有通過英文發表，我們對國際學界英文學界可能就不會有貢獻。但這完全不妨礙我們吸收別人的東西，估計不會有學術書籍、期刊或研討會因為我們寫作英文論文少，就拒絕我們看訂閱或參加相關活動。

從一個角度看，英美人最不國際化，因為他們大多只看英文，我們在內的亞洲許多國家在內，大多學界工作者本國語言之外，很大一部分兼讀英文，有些老師還看其他語文的文章。我們也希望對華文社群以外的學術界與社會有所貢

獻，若能如此，求之不得，理當歡迎，何況，只取不予也有點不好意思。現在的分工和語文能力，香港和新加坡做得不錯，這當然是好事，可以繼續。台灣或大陸假使強調英文寫作，我覺得反而是本末倒置，品質不好的論文，不會因為用英文寫作就變成好的論文，道理甚明。當然，兩岸學界不乏寫英文更順暢的人，這個時候就不須強調華文優先，反而可以在語言平等的原則下，尊重選擇以英文發表的人。

語言平等是有感於台灣有很多人，傾向於偏厚英文，我覺得這已經偏離國際化的內涵，要不得。如果要貢獻外語世界，另一個可能的作法是，我們出版一些合適的專題書籍，或是從華語期刊中選擇部分翻譯為英文(或其他外文)，不是很好嗎？這也是對海外學術社群的回饋。在語言上要平等，能夠讓大家知道某種安排是合理的，這是第一步。

邱林川：剛才在會議上有人說現時大家只看期刊，書籍和其他出版形式越來越不重要了。但是我想強調一下書籍的作用，未來希望能夠大家多關心書的市場。當然書和期刊之間是有聯繫的。我們大家在期刊上看到書評，而且還有視頻。譬如《傳播與社會學刊》裏面有一個叫做「視覺文本」的欄目，裏面有很多照片，體現了多媒體的時代。華人世界需要有這種嘗試，在其他學科的刊物也有類似 video essay 的形式，我們也可以讓學者製作一些優秀的錄像，可能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它們也是出版物，不應該被完全排除。

姜 飛：中國社會科學院下面有個科技組，目前已經在兩岸三地及海外採訪了70多位學者，積累了幾百盤影像資料，以後還會逐步推進。我們的目標是成立一個新聞傳播博物館。我們收集了很多一手資料，包括當年的手稿、會議、論文、書籍等。由於經費有限，如果那裏有經費資助，我們願意和大家合作，共用一些資訊。

胡智鋒：每家期刊的性質、任務、對象、使用的語言等都有不同，我認為不必用同一標準去衡量高下。既不必完全以全西方的學術理念與方式做標準去表達，也不必完全以中國大陸習慣的話

語方式做標準去表達，重要的是是否提出了有價值的思想、觀點、文獻與方法，是否可以推進學術和傳媒的進步。我們每10年會精選若干重要文章匯成《現代傳播文叢》，每五年會做一個刊物慶典座談會，每年會聯合院校或媒體組織若干主題性的論壇或個案研究。我們也正在考慮建立《現代傳播》英文網站，以加強刊物的國際交流。

期刊之間的合作

邵培仁：希望今後以全球中華傳播學術期刊聯盟為平台，以中華傳播學的核心理論為聚焦，建構中華傳播學術共同體，聯絡全球華人傳播學者，加強彼此的交流與合作，共同促進中華傳播學研究的發展與繁榮，向世界傳播學界發出中華傳播學術共同體的聲音。

學者之間的合作有待提高，本土學術的研究有待增強，華人學術圈的分隔有待完善。一個一個圈之間的交流也比較少，有的圈以院系為領地，如復旦大學有《新聞大學》，人民大學有《國際新聞界》，所以我覺得我們須要打破這種狀況。我建議類似這種主編圓桌會議，可以每年召開一次。這相當於一個學術聯盟，或者一個平台，大家加強合作，這樣我們在審稿中可以一起注意一些事情。我們可以就某些話題，在幾個刊物上同時發表，就可能在學術界產生影響。幾個刊物10多篇文章同時出來，這種影響是很大的。

陳韜文：中港台華文學術出版界應該建立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有資料庫的功能，用來容納中文的論文。SSCI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資料庫，這應該是要大力發展的。為甚麼重要呢？我們現在的研究生，看到那篇文章在網上找得到就看那一篇，如果很麻煩須要到圖書館去找的話，就不看了。另外「關鍵詞搜尋」(keyword search)是非常需要的。現在各自為政，香港沒有自己的SSCI，台灣有TSSCI，中國大陸有CSSCI，它們都是互無關係的。對《傳播與社會學刊》及其他學刊來說，應該

要統一起來，至少是互通的。好像我們可以申請加入 TSSCI，也可以加入 CSSCI，海峽兩岸也應可互通。在學術上「自成一國」是有問題的，因為學術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所以希望大陸和台灣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範圍能擴大一些，讓海外的學術刊物加進去。

三地資料庫應走向互通之路，但可以一步一腳印地慢慢發展，一下子聯合在一起實際上做不到。因為中國大陸考慮的是政治問題，海外的要納入其資料庫，他們肯定有很多考量。好像我們發表一篇文章有關台灣總統選舉，大陸方面就不承認馬英九是總統，只是地區領導人。倒不如我們第一步先希望 TSSCI 及 CSSCI 開放，讓其他地區的華文學刊可以申請加入。其次是將讓很多人都能容易地查找到 TSSCI 和 CSSCI 的資料，方便大家檢閱。

郝曉鳴：我非常欽佩香港的一些同事們，多年來在和國內學者的交流、培養國內的年輕教師上做了重要的工作。這些工作為我們今後的亞洲傳播學發展做了鋪墊。我們學校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些內地的年輕老師在我們學校學習過一段時間。我們希望這些學者有一些轉變，能夠把兩邊之間的差距縮短。我也希望有更多以雜誌或學校來牽頭，鼓勵國內、台灣、香港及境外的學者能搞更多的合作項目。

將來我希望刊物之間有更多合作。我們可以舉辦一個聯合性的大型調查，當然經費可以從各個地方來籌募。廣告、公關、新科技或健康傳播等不同方面都可以考慮，在兩岸三地、亞洲等地方，進行一些專題性的研究。總的來說，我覺得中華傳播研究進步很大，但是中間的距離也很大。好像國內學者談的問題和海外學者的想法沒有太大關係，我希望看到更多合作，特別是有組織性的大型項目研究。

陳炳宏：目前我先從《中華傳播學刊》做起，我已經陸續在建立台灣傳播社群的評審資料庫。我個人和香港、大陸的學界老師們不是很熟悉，期待我們是否可以各自建立自己的在地評審資料，將來可以通過交流，擴大學術社群的評審力量。在台灣

有時論文要送審時，評審會坦白告訴我，他一看到文章題目就知道這篇是誰寫的，不管是因為領域特性或因在研討會看過，這種情形在台灣好像常發生，那可審稿的評審量就會受到限制，或許三地將來可以共同建構一個跨地區的評審資料庫，擴大審稿者來源，這或許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

另外我們也可以有促進三地更多交流的設計。例如《中華傳播學刊》每年可以騰出一期，來設計一個「移地專題論壇」，邀請香港期刊同仁幫我們負責這個專論的邀稿及審稿，成為《中華傳播學刊》某期的專題論壇，而這個《中華傳播學刊》專論的目的，是讓台灣及其他地方的學術社群，能多了解香港當時最熱門的傳播議題。當然三地期刊也都可以這樣彼此合作，使三地有更多的傳播學術交流。

胡智鋒：我們《現代傳播》很願意加盟華語傳播學術期刊的交流與合作，歡迎海外華語傳播學者的大作隨時發來，也願意為期刊界合作出力。如需要，我們可以在經費、項目、編輯及其他方面交流合作上，做出我們的貢獻。

本文引用格式

蘇鑰機(編)(2013)。「學術出版與傳播研究」圓桌會議討論。《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3期，頁7-30。